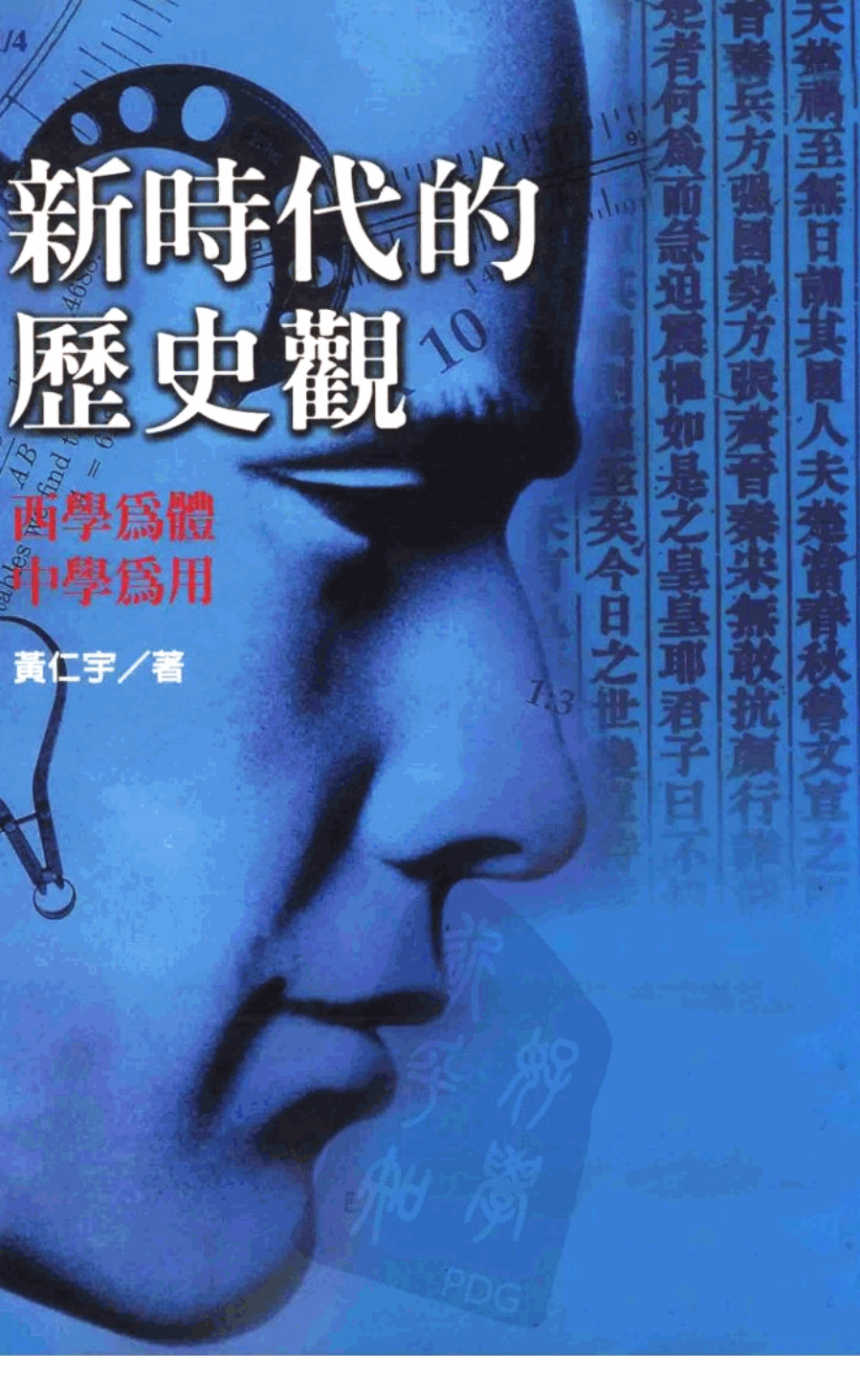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新時代的 歷史觀

西學爲體
中學爲用

黃仁宇／著

夫然禍至無日謂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所
晉秦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詐
是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

新學
新學
PDG

新時代的 歷史觀

西學爲體，中學爲用

黃仁宇／著

OPEN 1/4

新時代的歷史觀

西學爲體，中學爲用

作 者 黃仁宇
主 編 吳繼文
責任編輯 連翠榮
美術設計 張士勇 吳郁婷

發行人 郝明義

出版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地址：臺北市重慶南路1段37號
電話：(02)23116118／傳真：(02)23710274
讀者服務專線：0800561196
郵政劃撥：0000165-1 號
E-mail：cptw@ms12.hinet.net
出版事業登記證：局版北市業字第993號

初版一刷 1998年1月

定價新臺幣180元

ISBN 957-05-1434-5 (平裝)／06227000

OPEN是一種人本的寬厚。

OPEN是一種自由的開闊。

OPEN是一種平等的容納。

感謝 國立歷史博物館慨允借刊

開館四十週年紀念學術演講會文件之一部

目次

0
0
1

導言

0
0
7

中國需要大規模改造之由來

0
1
9

近代西方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之大勢所趨

0
4
3

中國現代史之輪廓

0
5
7

中學爲用的緣由及應賦予的考慮

0
6
5

「用」必須因「體」而調節

0
7
1

結論

擬「西學爲體，中學爲用」答客問

張之洞《勸學篇》

導言

中國長期革命業已成功。

我們同意於張之洞的看法：

既要「知本」，又要「知通」。

可是在正反前後的程序上接受現實。

先有現代化，才能發揮精神與效能。

大概距今約一百年張之洞作《勸學篇》（一八九八年刊），內中提及「圖救時者言新學，慮害道者守舊學。舊者不知通，新者不知本。」這是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」理論上的根據。

一百年後我們的衣食住行，對人態度、社會習慣，以及日用辭彙，都與晚清末年有了至大的差別，看來接受西方的經驗多，全部因襲於傳統的有限。這並非我提倡應當如此；而是實際的發展確已如此。

況且我們所引用的「體」與「用」也與前人所敘不同。在我看來，體是組織結構，對一個國家來講，包括政府行政系統，及於修憲與選舉，軍備與預算等等。就此看來，今日也仍是受西方的影響大，保留舊有的習慣少。即是今日之懸國旗唱國歌，參加國際會議與競技比賽，都與體制有關，也都與西方習慣銜合。惟獨「用」乃是精神與效能的發揮，反可以保持中國人的習慣與長處，做到張之洞所謂「知本」。

一百年前若有人預知今日中國效法西洋之程度，必定會蹙首長嘆。這也



張之洞(1837-1909)作《勸學篇》，提倡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」。

是標榜「中學爲體西學爲用」所作界限之用心。殊不知我們所謂「西學」，大概不過現代的思想與技術，絕大部份只在近五百年內發源於西方。即是西方每一個國家從「朝代國家」改造而爲「民族國家」的過程中，亦即從世紀社會進展到現代社會的過程中，也都要經過一段折磨，也都曾在棄舊從新的過程中感受到體與用間的徬徨。既然如此，我們早已無庸爲著「華夷之分」而躊躇。今天的父母送孩子上學，也必叮嚀他們注重外文，接受西方的自然科學不算，還要在政治學、經濟學、心理學諸方面迎合西方的新思潮。課後也在打棒球、學芭蕾舞、嫻習西方樂器，而海外華裔人士之出人頭地，也在這方面出類拔萃的爲多。這樣看來更只有適應潮流，只能體會古今之不同，而無從重視中外之別了。

然則中國傳統之長處、宗教思想、倫理觀念作人處世的宗旨應當放在甚麼地方？

我的建議：在答覆這問題前，先將中國歷史參照西方政治思想、經濟原理，作整面目的全幅修訂，看清中國受過西方衝擊，百年奮鬥後實現現代化

之由來。此中結論，必會表現一個新國家之形貌。有了新體制之輪廓，才能決定發揚傳統精神之出路。我的看法是：中國長期革命業已成功。我們同意於張之洞的看法：既要「知本」，又要「知通」。可是在正反前後的程序上接受現實。先有現代化，才能發揮精神與效能。此即「西學爲體中學爲用」的旨意所在。

中國需要 大規模改造之由來

日本完成西方式之現代化，
也加入逼迫，導致八年抗戰。
抗戰剛結束，內戰繼起。
這都是洪荒以來所未有的事蹟，
在世界歷史裡也少見。
中國需要全面大規模的重造，
而藉著這撼天動地的局面完成。

二十一年前我和李約瑟博士（Joseph Needham）合著一篇論文，題為〈從技術的角度解釋：中國社會之特徵〉（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: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）在香港及羅馬兩地出版，後經李氏於一九九一年作最後一次校訂，將刊於李著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》卷七之結論部份。我也和李氏生前有約：彼此在發表書刊時，均得引用此文的内容。

「社會之特徵」文內提起：中國在公元前，即因防洪、救災，及防禦北方游牧民族之侵犯，構成一個統一的局面，以文官治國，實行中央集權，可謂政治上的初期早熟。這種發展構成中國文化的燦爛光輝，可是也因為如此日後中國人須要付出至高之代價。

這種說法以地理、地質和天象學的觀測作根據，再與古籍對照，以期無所偏激。防洪的原因，出於黃河流域的特殊情形。原來黃河中流，正是公元前一千年至五百年中國人文萃薈之處，當中也正是一段廣泛的黃土地帶。黃土（Loess）主要由風力推運而堆積，因之顆粒纖細，於是黃河也經常挾有大量泥沙，一遇湮塞即有沖破河堤構成災患之虞。抗戰之前夕，一個夏季期

間之觀測，發現黃河之含沙量達百分之四十六，河南省陝縣附近一支流，多至百分之六十三。我們再翻閱《春秋》，看到公元前六五一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，盟誓之中有「毋決堤，毋曲防」的辭句（各書記載字句不同，但大意彼此符合。）《孟子》一書中即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，孟子自己又對白圭說，警告他勿以「鄰國爲壑」（《孟子·告子篇》）。可見得大規模防洪，即須較有力之中央權威，至秦始皇統一全國，碣石頌功，自稱「決通川防」，更稱秦爲「水德之始」，見於《史記》。這樣看來，因著自然環境之需要，中國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的統一，已帶著強迫性的力量了。

水患之外，中國又經常遇及旱災。原來中國的季候風屬於「氣旋風」（cyclonic）的性格。這也就是說：夏季由菲律賓海向中國大陸吹去的水蒸氣，全靠由西北吹來的旋風（cyclone）將之升高，濕氣才遇冷凝集爲雨。這樣一來，農作物需要的雨量，全待兩種未知數之邂逅而定。如果兩種氣流一再在每處上空聚頭，該處必有水災；反之若是兩者經常錯過，則成旱災。根據《古今圖書集成》及以後連續的記載，自漢至民國元年凡二一七七年，古籍載有水災一千六百二十一次，旱災一千三百九十二次。有時水旱並至，其

情形見於中央政府的記載。即美國中央情報局觀察中國的報告，最近情形仍是如此，我們可以想見《春秋》裏面說及因「背羅」或「阻羅」而發生的軍事衝突，內中亦有天災頻仍的原因在。只有較大的國家，掌握著不同方面的資源，才能在救災方面應付自如。梁惠王見孟子，即自稱「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內，河東凶亦然」，表示著這樣的情形。同樣局面之下「隋民綏，楚之贏」更把小國和大國間的利害說得透澈。這樣看來，始皇統一中國之前戰事愈來愈劇烈。更追溯幾百年的歷史倒看回去，春秋時代之一百七十國歸併而為戰國之「七雄」，而最後構成秦漢之大帝國，都與上述天候地理的背景上之要求符合。

這還不算，此外「十五吋等雨線」(15-inch isohyet line)也要使統一和集權不能避免(iso之義為「相同」，hyet來自希臘文huetos，為「雨」)。前說之氣旋風，也仍受亞洲大陸的限制。因著這限制，我們在中國地圖上可以畫出一條十五吋等雨線，北方與今日之長城大致符合，西方則經甘肅青海而抵西藏邊境。凡線之以南以東，平均每年至少有十五吋之雨量，可堪耕作，線之以北以西，則低於此最少的數量，少數民族只能以游牧